

高曉聲 著

紅文藝出版社

覓

882986

0318
4

0318

0064

覓

高曉聲 著

江蘇文藝出版社

觅 / 高晓声 著

责任编辑：叶兆言

出版发行：江苏文艺出版社（南京高云岭56号）

经 销：江苏省新华书店

印 刷：淮阴新华印刷厂

开 本：850×1168mm 1/32

印 张：7.25

插 页：4

字 数：150,000

版 次：1988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 数：5,350

标准书号：ISBN 7-5399-0055-5/I·52

统一书号：10141·1199

定 价：2.00 元

（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）

目 录

沉重的担子 (代前言)	1
送 田	7
恽门家事	29
礼 花	59
生 日	69
回 声	95
觅	113
临近终点站	201

沉重的担子

(代前言)

全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一开，天空就一下子变得特别晴朗了。春光关不住，现实亮出真相，妨碍我国文学事业发展、提高和繁荣的，确实是因为存在着“左”的偏向，所以要反“左”。

这个意见，符合绝大多数作家、评论家们的体验。所以大家很高兴，心情舒畅，对前途满怀信心。其实，马克思主义毕竟在中国已经传播了大半个世纪，一个稍有知识的老百姓，也懂得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应该是怎样的关系。对于近几年来时或出现的某些调调儿，大家心里都有主见，分辨得清的，因为这属于常识的范围之内。现在看到经济基础终于行使它的权力，命令意识形态同它协调，为它服务了。这原本一点也不奇怪，但是因为过去不正常，现在正常起来，便使人享受到了一种美，禁不住要叫好。这就象汽车离开公路在乱石滩上跑，被牵引回到公路上来了，谁看着都舒服。

当然，反“左”完全不是要打倒什么人。我赞成大鼓劲、

大团结、大繁荣的方针。在文学创作中无论是出现“左”的或右的失误，只要不违反法律，就要保证失误者在政治上不受歧视，不因此受到处分或其他组织处理。照顾到团结，也可以注意到不要随便触动那敏感的神经，不摆弄那伤感情的东西。打倒人，伤感情，都很容易。一九五七年反右派，一个巴掌打倒几十万，右派连不抵抗运动都不曾搞，可见其容易的程度为如何，只可惜有害于革命的事业。

也不要以为中央明确提出了反“左”，“左”便兵败如山倒，一切都迎刃而解，顷刻之间，这世界就变成了瑶林仙境。我倒认为中央提出来，还只能算是开了一个头。要能完成这个任务，只怕要花相当长的时间和撼山般的力气。“左”的偏向，存在的时期相当长，夏衍在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，以一个历史见证人的身份说：“……中国的无产阶级文艺诞生于三十年代的‘左’倾路线时期，在革命和战争中成长，片面地把文艺看作是教育和宣传的工具，这也已经有了半个世纪的历史，可以说‘左’的教条主义思想影响和习惯势力，是根深蒂固的。”文学界反“左”，从前没有搞过，一点经验也没有。我们有足够的反右经验，也有一批反右专家，可惜不能用来反“左”。要反还得白手起家呢。我们这些人，能在“左”的染缸里滚了几十年，有几个是真正干净的？要说干净的话，那是因为“左”的病毒钻在你的骨髓里，没有发觉而已。我倒并不是要把大家拖下水（下水也不可怕嘛，又不搞反右那一套），我是觉得担子重，眼睛光看着别人不行（你又不能打倒他），要把自己的隐病挑出来先治好，才有气力把那重担子挑下去。否则是不

行的。近几年来在文学界出现一种并不算个别的现象，有些吃了“左”的苦头几十年的右派，冤案得到平反后，自己出来工作了，忽然竟“左”得出奇，比“左派”还要“左”。那就是骨髓里“左”病毒发酵的结果，这类事，今后还会出现的，或者说现在也一天没有停止过出现。所以才有艰巨性。南京的鼓楼，以前有一个检阅台，一年前拆掉了。拆掉的原因很多，其中之一，据说是因为许多人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曾经在那上面挂过牌，挨过斗，低过头，认过罪，所以一看到它就不舒服。这可纯粹是属于感情范畴的，我极赞美这种感情。因为这种感情还不大普遍。南京的检阅台拆后不久，在常州，下了火车，出站顺大路过新丰桥，在大街右侧一幢高楼房的山墙上，新竖起一块特大的商店招牌，赫然写上五个醒目的大字：“左复兴饭店”。每一个方块字，比八仙桌面还要大些呢。这也许没有任何用意，可能店主人的名字就叫“左复兴”。可是他为什么从前取这样一个名字呢？为什么现在用他当店名呢？这里没有法律问题，甚至也不是思想问题，它也属于感情范畴。各种各样的人看了都会牵动感情的。现在它就竖在那里：“左复兴……”

难办就是这感情。一种力量，影响别人的感情、习惯，就最难改变。因为感情常常是不讲道理的，硬只是“我爱”、“我讨厌”，“我喜欢”，“我恨”，“我受不了”，“我渴望”……之类的东西。很难分辨这爱、这讨厌、这喜欢、这恨是不是“左”。我不知道别人是怎样的，至少我自己还缺乏这种自信、这种能力。比如说吧，过去反右，反资产阶级自由化，反精神污染，

都要查查文学刊物上发表过的文章，指出那些就是毛病。现在反“左”自然也应该落实到检查文章内容的，究竟怎样的小说才是“左”的呢？才是应该批评的呢？我就觉察得很少。而这很少的觉察物，又往往偏有人称赞为好作品，而称赞者又不是“左”派。当然，我也知道那是称赞错了的，不过从他身上，我又反省自己，也许那又是我的一面镜子。我可能有些时候也称赞那些“左”的呢。

再比如说吧，过去文学有幸得到政治的过分青睐，在文学评论的文章中，移植进许多政治术语，“左”和“右”，也是从那儿来的吧。近几年来，因为时代不允许了，继续搞“左”的人为了场面上表示温和，便从音乐界去借了一个“调子”来，从美术家去借了一个“色彩”来，从摄影界去借了一个“光线”来。用“调子太低”、“色彩灰暗”、“亮度不够”……来评价作品，而标准又明明是从政治出发的。政治问题本来是极严肃的问题，却用那样含义模糊的词语去评述。那是令人毛骨悚然的。

前些时候，人民日报揭露了有个县刮浮夸风，同时，报道了党中央对于这个问题的高度警惕，谆谆告诫，严格地要求立即纠正。看了之后，我是十分感动的。因而想到，那些搞政治的文学工作者，怎么没有把“浮夸风”这个词移植到文学评论中来呢？这是否意味着别的领域有浮夸风，唯独文学创作没有呢？或是说别条战线上不允许搞浮夸风，唯独文学创作倒不妨一搞或无妨大搞呢？这里是否也有一个“左”不“左”的问题？我可是完全弄不清楚了。好在有识之士甚多，以后会有就教的机会的。

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泉,这是我国最普及的创作知识,但是带了什么去?去了做什么?意见也并不是一致的。胡启立同志代表党中央向大会祝词中谈到这一点,他说:“……我们并且希望,我们的作家努力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,自觉运用它去认识生活,分析生活,表现生活。”这是个明白正确的答案。我想这意见是说,认识生活、分析生活要有正确的观点和方法。而目的则是表现生活。也只有如此,才能够正确地表现生活。但是,也还有另一种情形,一种相当普遍而且明知故犯的情况,就是带着一个预定的概念到生活里去寻找能够表现他那概念的情节。削足就履,在所不惜。而且往往受到称赞。其原因大概在于那预先做的履是很漂亮吧,光看着就讨人喜欢呢。是否穿得合适则是另一回事了。当“艺术品”欣赏也挺可以吗。

一篇小说写好了,总是有褒有贬,有歌颂也有揭露,这是用正确的观点和方法去认识生活、分析生活,表现生活的必然结果。是不以作家的个人意志为转移的。但是你不能将果作因,带着“我要歌颂或揭露”的主观意图到生活中去找情节(找不到就歪曲或搞浮夸),这种因果关系的颠倒叛离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,是否也存在“左”不“左”的问题呢?生活是一匹野马,掌握不易,有时要出格冒风险,不如“设想”容易而安全。问题就在于你不忠于它(生活),它也不会忠于你!什么是新的,什么是旧的,会同你的设想相反,会同你残酷地开玩笑。你还不自知,把玩笑转给读者,这又算什么呢?

我讲这些，意思是说我们有很多繁重艰巨的工作要做，
轻松还没有来，不要先轻松。

让我们一起努力吧！

送 田



在南周村上，最不会算帐的人，也明白现在种田是出大力气赚小钱的职业。同住一个村上，多年来都走共同富裕的道路，可是，在厂的人过什么日子？在采石场的人过什么日子？做小生意的人过什么日子？搞运输的过什么日子？凭技术做包工的过什么日子？干部过什么日子？种田人过什么日子？全都清清楚楚。瞎子看不见，哑子不会说，心里都明白。

南周村是个富村，从外表上一眼就看得出。只要看那房屋，新房子把旧房子挤进地下了，挤在缝里了。可怜它们从前也住过人，如今能幸存下来，却是甘心受委屈做猪舍柴屋。它们原来的主人都住到新房子里去了。难得还有几家住老屋，那也并非特别念旧，不过是没有造出新的来罢了。而这样的人，自然越来越少，所以形势越来越好。更加难得的，是有

一批造了新房的人，竟象造出了瘾头来，每过三年四年，就要大动土木。比如周锡林，就最有代表性。南周村上是他第一个造新屋，十步两开间，足有七十五平方公尺。过了三年，看见造的人多了，竟赶上他了，这就显不出他独阔。好，干脆拆了重造楼房。造楼房先造二层，可是他有预见性，估计过几年村上二层楼又会普及，所以造二层楼的时候，墙脚里就下了大本钱，打的五层楼基础。果然，再两年，许多人造二层楼了。他便在二层上面轻轻巧巧加一层，变三层。到去年，村子上好些三层楼出现了。他又不慌不忙在三层上面加一层，变四层。造来造去，房子越造越高，越造越好，形势可真不是小好，是大好。而且最好最高的，还是周锡林那一幢。真了得！时代不会埋没英雄。

南周村上的人靠什么赚到钱造房子？说起来简单，最初无非是靠几块石头。石头是天天看见的，可是想到它能让许多人过好日子却不容易。苏南这块地方，工厂也多，土地也肥，赚钱的门道多得很，谁的眼睛也不轻易会去瞧上那些又硬又冷又重又呆的石头。南周村所在的丰裕乡，有几座光秃秃的小荒山，土肉瘦薄，山坡上的青草象癞痢头上的毛，没一点神气，种了树都不长，没一点出息。不知被大家咒骂了多少年。五八年大跃进，虽然我们没有提出以石为纲，但到处造桥、筑路、盖厂房，还要修补被英雄们踢破的地球和截破的天，石头一下子也便象粮食一样，变成了基础的基础，宝贝中的宝贝。

好家伙，这儿可不是四川峨嵋山，整个地区都缺大量的

石头。这儿的石头却在脚底下睡大觉，实在太冤了！于是，一点儿没有出息的荒山一下子就变成了使不完、用不尽的金山银山。乡里办了个采石厂，各村各队都调人上山采石。采石工全年的工资，比在生产队种田的社员高三倍、四倍。可惜不能让大家去，农业是基础，粮食是个纲，田地要人种哪！咱们不能光算经济帐，要算政治帐哪！

那么，该谁去，该谁不去呢？极复杂，说不清楚。

这不奇怪，世界上说不清楚的事情比说得清楚的事情多得多。在说得清楚的事情里面还有许多不该说清楚，不便说清楚的，连不该和不便说清楚的原因也有许多不清不白的地方呢。所以干脆莫说它了。反正去的，不去的，吃亏的、沾光的，都是我们自己的事情，和外国人没有关系。

且举两个代表人物做例子吧。比如周锡林，那自然是要去的。不但去，而且负点责任，因为他觉悟高，有经验，到任什么地方去都能负点责任，到任什么地方都能表示还可以多负点责任。在村里是这样，上采石厂是这样，后来又调去其他单位，也全是这样。而且虎父不生犬子，精明人家的门子都是能够舂出白米来的榔头。挺出息。两儿两女两媳妇，没有一双手捏锄头柄的。领导、供销、会计、技术员、工人，这一家门都占全了。所以不管有没有政策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，事实上他早就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占了先。他那幢房子不就说明问题了吗。他一家倘若在田里苦，到哪一年才能闯出这个场面来！真是赚钱不吃力，吃力不赚钱呀！谁说文化知识没有用呢，这要有阶级分析。要看文化知识掌握在谁手

里，资产阶级把字典背熟在肚里也没屁用，他周锡林能识得《人民日报》上一半铅字，在乡里摆擂台也没人敢上去打了。赵匡胤做皇帝，靠半部《论语》治天下^①，那么，凭周锡林肚里那点墨水，还有什么涂不黑的呢。总说“文官动动笔，武官干一日”，真是不错。那生活悠闲的情趣，冬天龟缩在屋子里不容易让外人看到，夏天就表现得非常清楚，天还不曾夜，一家子已经洗头洗脚洗身子，弄得干干净净香喷喷，坐在屋顶上吃晚饭。屋顶是钢筋水泥浇的，四周围着栏杆，还点缀有花卉盆景，真可算得是个屋顶花园了。吃过晚饭纳凉，周锡林就坐上一张特制的椅子，这椅子的四只脚装在两根抛物线型的木棍上，人坐在上面，只要重心略略变动，那椅子便一前一后摆动，俯仰之间，天上的星星和地上的灯火，全过了目。象看一朵朵放光的花一样，舒舒服服，安稳得叫人不想动脑子。

真开心。简直是神仙过的日子。房子高了不光威风，风还大，蚊虫也少（下面有血吸，它花力气高飞干什么），再一个好处呢，就是看得远。“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”嘛！……

一说那么多，真弄糊涂了。我是在举两个代表人物，说到这里还只说了一个。另一个是谁呢——就说周炳南吧。周炳南就是该不去的，就是该让别人去的。有许多人争不着干采石厂的长工，农闲时还可以去做一阵临时工，一年也能收入三、四百，周炳南连这也不能够，干临时工也该让别人去。

^① 赵匡胤是赵普之误，民间有赵普半部《论语》治天下的传说。

总而言之，周炳南该的只有一样，就是侍候土地公公，土地婆婆。别的都该让别人去干。若问为什么，不必写出来，一则被人写烂了，二则事情过去了，三则说出来反而挂一漏万。要知道南周村上象周炳南那样一贯忠诚于种田事业的还有好几家，各有不同情况，写了周炳南一个，别人就会骂不公平，为什么不写他们呢？

还是直截了当说结果吧！结果是什么？就是周炳南一家五口子造不起新房子，还住在同别人家做了猪圈一样的老屋里。

写到这里，应该特别声明的是，这种情况是正常的。周炳南本人没有一丝一毫抱怨情绪，你叫他是阿Q也好，你鼓励他从阿Q的翅膀（不知道阿Q什么时候长出翅膀来了？原来不是只有一条辫子吗？）下飞出来也好，甚至你鄙弃他，认为不能写入小说也好，都没有关系。但千万不要替他打抱不平，你打不了，他也不需要。他也跟着大家，在新社会里活到现在了，一点不比你差。他风格高，见好处就让，见困难就上。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。他知道水涨船高，他横竖也在船上呢。这看法完全没有错，现在就轮到他有钱造房子了。

周炳南有钱造房子，也是到采石厂去做工赚来的。文化大革命一完蛋，周炳南“该不去”的理由忽然没有人再说得出口（可见羞恶之心，人皆有之）。不过没有了该他不去的理由并不等于该他去。该他去还有别的原因，那是因为乡里办了些比采石厂还要好的工厂，那儿安全、干净、轻快，赚的钱